

新疆考古——

考古中国

多元文化汇为一体的长卷

郭 物

新疆大地上的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5处不可移动文物与45万多件可移动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与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数代文博工作者薪火相传,潜心阐释文明密码,让文化遗产成为滋养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2017年起,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新疆考古制定了五年工作规划,梳理了主要的学术目标,考古工作进入系统全面和重点突出的新阶段。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得到大力的、持续的支持,相关课题被纳入“考古中国”的总体框架,“新疆早期文明综合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等课题取得了系统性的进步和突破。尤其是2018年开始,全国多家高校和考古机构参与到新疆的考古工作中,构建了“五湖四海”工作格局和“包罗万象”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托普鲁克墩佛寺三号遗址出土的唐装人物壁画。

新疆考古——

考古中国

多元文化汇为一体的长卷

郭 物

新疆大地上的6处世界文化遗产,9545处不可移动文物与45万多件可移动文物,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与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数代文博工作者薪火相传,潜心阐释文明密码,让文化遗产成为滋养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

2017年起,在国家文物局的组织下,新疆考古制定了五年工作规划,梳理了主要的学术目标,考古工作进入系统全面和重点突出的新阶段。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得到大力的、持续的支持,相关课题被纳入“考古中国”的总体框架,“新疆早期文明综合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等课题取得了系统性的进步和突破。尤其是2018年开始,全国多家高校和考古机构参与到新疆的考古工作中,构建了“五湖四海”工作格局和“包罗万象”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托普鲁克墩佛寺三号遗址出土的唐装人物壁画。

如今,人工智能正从多领域、多层次重塑博物馆的展现形态与功能边界。

信息处理层面,人工智能是“超级助手”。对于博物馆中海量的藏品图片、文字信息和文献资料,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技术,可以自动完成数据提取、识别、分类。在内容生成层面,人工智能是“灵感源泉”。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被部分博物馆用来辅助开发教育项目和社交媒体互动,让博物馆的传播方式变得更多样有趣。今年大受欢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数字一天·不忘初心”、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那边是唐朝”等大空间VR沉浸式体验项目,就是数字孪生与AI+3D重建技术赋能文旅、活化历史的成功尝试。在重塑体验方面,人工智能是“贴心伙伴”。人机交互技术能给观众提供便捷和个性化的参观服务,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22年推出的虚拟数智人“艾雯雯”,能够进行个性化讲解,深受观众欢迎。在藏品保护层面,人工智能是“全能守护者”。一些博物馆配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应用,部分实现了风险预警与自适应调控。

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将引发中国博物馆事业从理念到实践的双重升级。博物馆从信息传播者升级为意义生产共创平台,从传统服务升级为多元体验。这些升级正在持续重塑现代博物馆的价值逻辑。

然而,在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博物馆的初期阶段,其应用实践仍面临着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内容的准确性。训练数据偏差和算法黑箱等问题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生成不准确甚至错误信息,这会给以传播准确知识为使命的博物馆带来较大风险。人工智能的知识生产能力不足是另一显著瓶颈。人工智能擅长信息的重组与演绎,但目前还无法做出真正的原创性研究成果。

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进行内容生产,会削弱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核心功能。协同机制与行业标准欠缺也制约着人工智能在博物馆领域广泛运用。目前,我国博物馆的人工智能应用仍缺乏技术标准和整体规划,导致数据孤岛普遍存在,系统间难以协同共享。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人工智能应用恐将长期停留在“盆景点缀”的状态。此外,许多中小型博物馆受限于资金与人才,难以承担人工智能相关技术的引入与维护成本。

面向未来,博物馆在数字化浪潮中应着力于夯实基础、洞察需求和重构功能。基础建设不仅涵盖网络、算力等硬件支撑,也包括统一互通的数据标准和高质量的藏品数字资源库建设。通过充分的科学调研把握观众需求,并对人工智能的运用效果进行评估与持续改进,方能真正实现科技赋能博物馆发展。

对于博物馆来说,人工智能不只是辅助工具,更应成为激发创新与变革的催化剂,推动博物馆突破限制发展的无形“围墙”,成为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文化枢纽。

楚袂惊鸿越古今

田豆豆

龙飞凤舞于罗衾之上,虎啸龙吟于锦绣之中。“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屈原笔下的楚国女子,其华美的服饰到底什么样?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开展的荆州马山一号楚墓织绣品特展,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循着一丝一线,走入一场千年的梦——展厅入口处,一只造型奇丽、色彩缤纷的楚绣凤鸟,将人们带入这个战国时代的丝绸宝库。

丝织品是最难保存的文物品类,能以原有形态完整保存的更为稀少。1982年,人们在湖北省江陵县马山镇(今属荆州市)发现了一座不大的古墓,随着发掘的深入,大批保存完好、纹饰精美的丝织品惊艳世人。单衣、袍服、锦袴、鞋履形制完整,绢纱、罗绮、丝缕、锦绣应有尽有。这里几乎囊括了先秦时期所有的丝织品种类。此次展览共展出16件珍贵的织绣文物及3件复制品,通过“楚袂惊鸿”“衣绣锦缘”“溯洄从之”三大单元全景式展现了战国楚人的服饰风华,楚国高超的纺织与刺绣工艺和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历程。

“楚袂惊鸿”单元,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历经2年修复后首次亮相的一凤一龙相蟠纹织绣红绢单衣。单衣为楚服的一种,与夹襦、绵袍相比,只有单层,更为轻薄。远观,这件单衣交领右衽,直裾、颈部和袖口包边的样式令人十分眼熟,它便是今日“战国袍”最早的模板之一。因为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是目前研究战国丝绸服饰唯一的实物资料。近看,单衣上刺绣精美,凤龙盘绕,显示了楚人崇凤的图腾信仰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高度还原的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纹样精美。这件蚕丝填充的华丽绵袍上,刺绣着造型独特的三头凤,凤鸟的双翅勾形成了另外两个风头。凤鸟的肚子圆鼓鼓的,仿佛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三生万物,“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深刻,加上圆形的肚子,这充满想象的凤鸟形象承载着楚人祈愿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



工作室里,68岁的安宇歌轻抚一片薄如蝉翼的铁片,一串清越婉转的旋律便如溪水般流淌而出。这枚长不足10厘米的“小玩意”,正是被称为可吹出“女子心事”的宁夏民间乐器——口弦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安宇歌用半生时光,将千年古音从山野带向世界舞台。

1988年,安宇歌踏上非遗保护之路。彼时,口弦琴已几近绝响:会制作的老艺人相继离世,资料寥寥无几。她背上行囊,开始行走在宁夏的山间乡野。

一年寒冬腊月,她听说海原有位口弦琴

楚袂惊鸿越古今

田豆豆

龙飞凤舞于罗衾之上,虎啸龙吟于锦绣之中。“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屈原笔下的楚国女子,其华美的服饰到底什么样?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开展的荆州马山一号楚墓织绣品特展,提供了清晰的答案。循着一丝一线,走入一场千年的梦——展厅入口处,一只造型奇丽、色彩缤纷的楚绣凤鸟,将人们带入这个战国时代的丝绸宝库。

丝织品是最难保存的文物品类,能以原有形态完整保存的更为稀少。1982年,人们在湖北省江陵县马山镇(今属荆州市)发现了一座不大的古墓,随着发掘的深入,大批保存完好、纹饰精美的丝织品惊艳世人。单衣、袍服、锦袴、鞋履形制完整,绢纱、罗绮、丝缕、锦绣应有尽有。这里几乎囊括了先秦时期所有的丝织品种类。此次展览共展出16件珍贵的织绣文物及3件复制品,通过“楚袂惊鸿”“衣绣锦缘”“溯洄从之”三大单元全景式展现了战国楚人的服饰风华,楚国高超的纺织与刺绣工艺和马山一号楚墓的发掘历程。

“楚袂惊鸿”单元,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历经2年修复后首次亮相的一凤一龙相蟠纹织绣红绢单衣。单衣为楚服的一种,与夹襦、绵袍相比,只有单层,更为轻薄。远观,这件单衣交领右衽,直裾、颈部和袖口包边的样式令人十分眼熟,它便是今日“战国袍”最早的模板之一。因为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是目前研究战国丝绸服饰唯一的实物资料。近看,单衣上刺绣精美,凤龙盘绕,显示了楚人崇凤的图腾信仰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高度还原的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纹样精美。这件蚕丝填充的华丽绵袍上,刺绣着造型独特的三头凤,凤鸟的双翅勾形成了另外两个风头。凤鸟的肚子圆鼓鼓的,仿佛正孕育着一个新生命。三生万物,“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深刻,加上圆形的肚子,这充满想象的凤鸟形象承载着楚人祈愿生生不息的美好愿望。

口弦琴,塞上江南的千年古音

秦瑞杰

制作高手,便用大半个月工资雇了一辆农用车进山。颠簸5小时,到门口却只见铁锁挂门,村民告诉她,这家的男主人去新疆打工了。直到入夜,才等到女主人回来。晚上,安宇歌睡在这家人的土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恍惚间想:这风声,不正是口弦琴的呜咽吗?

采风十余载,这样的辛苦往返,成了安宇歌寻艺路上的常态。最艰难时,她背着幼子下乡。儿子李旭听着口弦琴声长大,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奏。如今,李旭不仅能制作造型独特的口弦琴,还协助母亲完善了口弦琴记谱。“他听口弦琴的神情,就像当年的我。”安宇歌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安宇歌在“祥云小屋”展示口弦琴技艺。一曲终了,外国观众围在门口:“这么小的乐器,怎能发出如此有穿透力的声音?”她即将将口弦琴抵在唇边,演奏中,仿佛世界都听见了塞上江南的千年古音。

此后,安宇歌的足迹遍及亚非欧。一次在西班牙孔子学院授课的经历让她记忆犹新。“我让现场观众把眼睛闭上,只用耳朵去听。”口弦轻颤,簧片震动,仿佛雨水敲打铁盆,无数观众在这种陌生的旋律中沉醉。

从冀南币到人民币

谭博洋 刘冬梅

在河北博物院“山河永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革命文物展”中,冀南银行系列文物引人注目,它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金融战线的壮阔征程。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冀南银行,以“发展生产、经济斗争”为历史使命,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筑起坚实的金融长城,被誉为“新中国的金融摇篮”。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主战场。日军对根据地实施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金融掠夺,滥发伪币、强推“军用票”,国民政府则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给。在这样的危局下,创建根据地自己的银行、发行本位货币,成为关乎抗战生死存亡的战略抉择。

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河北南宫和山西黎城同时成立,首任行长为高捷成,太行、冀南同时宣布营业发行冀南币,逐步形成横跨太行、太岳、冀南三大战略区的金融网络。银行初创时条件极为简陋,工作人员没有固定场所,就以民房为营;缺少印制票币的设备和材料,采取就地取材、以土代洋和“取之于敌、虎穴取材”的办法克服困难。

冀南银行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抗战命运紧密相连。银行干部职工大多是久经战火考验的革命战士,他们怀揣“抗战救国”的信念,将银行建设视为抗日斗争的重要战场。在硝烟弥漫、险象环生的战争年代,冀南银行的革命先辈们昼伏夜行,随军辗转,账款物资常由马驮运输,战况紧急时则背负挎包随身携带,因此冀南银行被誉为“马背银行”“挎包银行”。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在河北内邱遭遇日寇,在突围中为解救战友、保护银行机密文件而壮烈牺牲。这些饱经沧桑的文物,正是冀南银行的革命先辈们不畏艰险、不惧牺牲、服务人民、坚持抗战的生动历史写照。

作为太行、太岳、冀南三大战略区的本位货币,冀南币的发行流通绝非简单的金融行为,而是一场关乎根据地经济主权的“货币战争”。

冀南银行以大量战略物资为准备金,依据掌握的根据地粮食、棉花(布)、食油等物资灵活调节物价,巩固冀南币发行信用。针对日寇“以战养战”的掠夺政策,冀南银行坚决打击伪币和法币投机,通过大力宣传、建立冀南币识别所、组织经济游击队、禁止使用日伪币和肃清各类杂钞等斗争,打击了日伪的货币政策,抑制了土票杂钞,扩大了冀南币的流通范围,使根据地的金融市场趋向稳定和统一。抗战时期,冀南银行以近半数的发行额用来保障根据地军民的财政、军政经费,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给了根据地建设以有力的保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冀南银行的使命不断拓展。解放战争时期,冀南币的流通范围扩大到整个华北解放区,成为华北地区的法定本位货币。1948年10月1日,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组建华北银行;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伍圆券印钞石版是河北博物院收藏的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人民银行首次发行人民币时使用的印刷版实物,印证了石印技术在中国现代货币制造中最后应用阶段的史实。

从冀南币到人民币,从冀南银行到中国人民银行,红色金融事业在战火中孕育、在奋斗中成长,冀南银行作为“新中国金融摇篮”的历史地位,被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当年冀南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系列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新时代中华儿女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的精神源泉。

(作者单位:河北博物院)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对襟款式服装,湖北荆州马山一号楚墓出土。

王郭骥摄

▲冀南银行发行的拾圆钞票。

河北博物院供图